

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 及影响因素分析

肖黎明 于翠凤¹

(山西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构建文旅融合指标体系, 运用 ESDA、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考察 2004—2017 年中国 31 个省份及分区域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1) 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整体表现为基本协调, 区域发展存在较明显差异, 西南及西北地区轻度失调, 华北、华中及东北基本协调, 而华东及华南达到中度协调状态。(2) 绿色文旅融合发展空间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梯度递减趋势, 存在明显空间分异。(3) 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度呈现空间集聚, 整体上呈良好发展态势, 但区域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分异。(4) 旅游产业基础、文化产业基础、绿色文化消费、旅游产业收入、文化产业经营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具有较强贡献率, 而旅游环境建设的贡献率则较小。

【关键词】 绿色文旅融合 时空特征 影响因素 地理探测器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407(2021)08-118-08

近年来, 伴随着文化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已形成若干“旅游+”“文化+”融合发展的新业态。特别是 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门机构重组以来, 文旅融合这一“老命题”再次发酵为讨论热点^[1]。如习近平主席在向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2 届全体大会致贺词中所指出的那样: “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 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 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基于此, 应该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文旅融合发展对于新时期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意义也就显而易见。

目前, 学界有关绿色产业的研究, 除了就绿色产业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和理论阐释外, 还涉及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介绍、具体区域或单个行业绿色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研究等方面^[2]。

而就文旅融合方面来说, 国外学者主要是针对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具体业态进行考察的, 其中涉及文化旅游、影视旅游、节事旅游、创意旅游等方面的内容, 基本上认为旅游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有利于提高旅游地的形象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 从而有利于促进两大产业的协同发展^[3-4]。而国内有关于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5-7]、动因及效应分析^[8]、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9-10]、发展趋势分析^[11]等方面, 已初步形成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理论体系, 同时, 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此外, 也有学者尝试通过建立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耦合的评价体系, 来定量分析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相关空间分析^[12-14], 同时, 学者也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12], 发现我国旅游与文化产业的总体融合水平在不断提升, 地区上呈现正向集聚状态, 且东西部地区的融合程度存在较大差距。至于绿色文旅融合, 目前尚未有学者明确提及, 只

¹作者简介: 肖黎明,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绿色创新与发展。E-mail: xiaolm1972@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我国省际绿色创新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异质性溢出研究”(17BJY038)

是就基于绿色发展的文旅小镇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15]。

综上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已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索,但其中大多数研究只是从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视角出发,探究其发展模式、机制和路径等,很少有人考虑到这一融合过程中可能触及的环境污染及生态保护问题,且现有研究大多采用较为单一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少有将数理模型、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多学科方法和工具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尤其是尚未发现有从量化分析层面对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然而,随着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高质量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延续和拓展,将成为保持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这样一来,对绿色文旅融合的量化和测度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使得区域发展研究中对于生态要素的测评变得不可或缺^[16]。基于此,本文在梳理绿色文旅融合的概念和机理的基础上,尝试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地理探测器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 31 个省份 2004—2017 年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同时,进行地区间的分析与比较,以期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也尝试为我国绿色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提供某些参考。

1 绿色文旅融合指标体系构建

1.1 绿色文旅产业融合的互动机理

旅游产业的经济性与文化性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产业融合以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市场融合为前提,通过渗透、交叉或重组方式形成新的产业形态^[17]。而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则是一个以文化带动旅游发展,以旅游促进文化发展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互惠共赢的过程,因此,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对于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同时受益于相关文献的研究^[18],本文认为绿色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市场融合、人才融合、机构融合、生态融合等方面,其核心要义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的综合效益^[12]。

(1) 市场融合。

市场融合导致产业边界的收缩,随着体验经济的迅速兴起,消费者既要求旅游产业兼具文化性,又要求文化产业兼具游览价值,因而两大产业融合有利于产生新业态和新产品。

(2) 人才融合。

旅游与文化产业对人力资源均提出了较高要求,也即要求其从业人员的工作既承担旅游产业的主体功能,又能体现文化产业的关键内涵。

(3) 机构融合。

现实中,许多博物馆、文化娱乐场所等在运营初期主要承担文化传播等功能,当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之后,将会持续吸引大量游客,从而既承担着文化传播主体功能,又具备旅游观光的衍生功能。

(4) 生态融合。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持续深入,在文化与旅游业的相互融合中,要求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构

建旅游开发的生态保护机制，颁布相应的绿色政策，引导人们在感受文化的熏陶和旅游带来的愉悦的同时，自觉践行“美丽中国”行动方案，最终形成绿色旅游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1.2 绿色文旅融合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建立是本文研究的关键，然而目前国内尚没有统一的有关绿色文旅融合的相关指标体系，基于此，从产业融合的有关文献着手，结合上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本文尝试按如下思路构建绿色文旅融合的指标体系：首先根据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各自特点和内涵，分别确立相关指标。其次，在该体系中纳入体现“绿色”理念的相关指标，总体上将指标体系区分为绿色旅游产业发展系统和绿色文化产业发展系统，其中，绿色旅游产业评价指标包括旅游产业收入、旅游产业基础及旅游环境建设3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绿色文化产业评价指标由文化产业经营、文化产业基础及绿色文化消费3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组成，具体考虑如下。

一方面，由于旅游业总体上是一个资源消耗相对较低、环境污染相对较小的行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天然具有绿色环保性，从而也就使得旅游产业的科学合理发展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目前学者对于绿色旅游产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其自然生态状况进行评价，因此，自然保护区面积即可直接反映当地绿色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保护意识，同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19-23]，从而以自然保护区面积体现旅游产业绿色生态建设情况。此外，以人均公园绿地表征公园绿地普及度面积，以环境治理投资总额、绿化覆盖面积体现绿色政策支持，以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体现资源环境质量。

另一方面，由于新发展理念本身内含着绿色化的思维，因此，可借鉴其内涵来体现文化产业的绿色属性^[24-26]，其中，协调的重点是城乡协调、区域协调。进一步结合上述绿色文旅融合的互动机理，从市场需求与政府投入出发来考量文化产业的绿色内涵，其中，市场需求可通过城乡人均文化消费来衡量，政府投入则对应区域协调，从而以政府在人均文化事业费上的支出来衡量区域协调。由于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同时，考虑到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本文从居民的绿色生活入手，通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游人数、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观众人数、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来衡量居民如何利用文化产业实现绿色生活。此外，因绿色消费是一种具有较强生态意识、较高环境友好度的理性消费行为，因此，可利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性支出来体现绿色消费，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等产出，推动形成绿色产业链生态系统。同时，依据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实施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最终构建绿色文旅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1) 熵值法。

旅游产业及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为多因素综合评价，因此，需要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本文利用熵值法对所选定的旅游产业及文化产业系统进行客观赋权，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具体步骤为：

① 指标标准化。

因所选指标的量纲不一致，因而在计算指标权重前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X_{ij} = \frac{x_{ij} - \min_{x_{ij}}}{\max_{x_{ij}} - \min_{x_{ij}}} \quad (1)$$

负向指标:

$$X_{ij} = \frac{\max_{x_{ij}} - x_{ij}}{\max_{x_{ij}} - \min_{x_{ij}}} \quad (2)$$

表 1 绿色文旅融合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旅游产业收入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百万美元
		国内旅游收入	万元
		旅行社营业收入	千元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	千元
绿色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基础	旅行社从业人数	人
		旅行社数量	家
		星级饭店从业人数	人
		星级饭店数	家
	旅游环境建设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亿元
		绿化覆盖面积	公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森林覆盖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自然保护区个数	个
		自然保护区面积	万公顷
绿色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经营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利润	千元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收入	千元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入	千元
		文化事业费	万元

	文化产业基础	博物馆从业人数	人
		博物馆个数	个
		公共图书馆从业人数	人
		公共图书馆个数	个
		艺术表演团体从业人数	人
		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	个
	绿色文化消费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性支出	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性支出	元
		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观众人次	万人
		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	万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游入量	万人

式中： x_{ij} 为*i*年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值， X_{ij} 为每个指标的标准化结果， $\min x_j$ 为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 $\max x_j$ 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

②确定第*i*年第*j*项指标的比重 P_{ij} ：

$$P_{ij} = \frac{x_{ij}}{\sum_{j=1}^m x_{ij}} \quad (3)$$

③确定第*j*项指标的熵值 E_j ：

$$E_j = \frac{-1}{\ln m} \sum_{j=1}^m P_{ij} \ln P_{ij} \quad (4)$$

$j = 1, 2, \dots, m; 0 \leq E_j \leq 1$

④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冗余度 D_j ：

$$D_j = 1 - E_j \quad (5)$$

⑤第*j*项指标权重确定：

$$W_j = \frac{D_j}{\sum_{i=1}^n D_j} \quad (6)$$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衡量系统相互作用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协调度则可以反映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由于绿色旅游产业与绿色文化产业是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因此，为探究二者的融合发展程度如何，可以通过构建绿色旅游产业与绿色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来予以反映^[1]，其计算公式如下。

①综合评价函数。

若 $x_1, x_2, \dots, x_n$ 为绿色旅游产业评价系统的 n 个指标， $y_1, y_2, \dots, y_m$ 为绿色文化产业评价系统的 m 个指标，综合评价函数表示为：

$$f(x) = \sum_{i=1}^n a_i X_i \quad (7)$$

$$g(x) = \sum_{i=1}^m b_i Y_i \quad (8)$$

式中： a_i 、 b_i 为相关指标的权重值， X_i 、 Y_i 为指标标准化后的结果。

②耦合协调度。

$$C = \sqrt{\frac{f(x) \times g(x)}{(\frac{f(x) + g(x)}{2})^2}} \quad (9)$$

$$D = \sqrt{C \times T} \quad (10)$$

$$T = \alpha f(x) + \beta g(x)$$

式中： D 为耦合协调度值， T 为绿色旅游产业及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数， D 、 T 取值范围在 $[0, 1]$ ； α ， β 为各系统权重系数，且有 $\alpha + \beta = 1$ ，由于绿色文化产业与绿色旅游产业是两个相互独立且有交叉的系统，因此取 $\alpha = \beta = 0.5$ 。同时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22]，将耦合协调度分为 7 个等级，并构建绿色文旅融合产业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表 2)。

表 2 绿色文旅融合产业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极度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基本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极度协调
(0,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8]	(0.8, 1.0]

(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ESDA)。

ESDA 可用来检验某一现象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单元的现象具有联系, 是解释研究对象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1]。本文则选取全局空间自相关的全局 Moran' sI 指数和局部关联分析方法的 LISA 统计量来进行分析。

①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用来考察某个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 其中全局 Moran' sI 的计算公式为:

$$Moran's I = \frac{n \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um_{i=1}^n \sum_{j=1}^n W_{ij} \sum_{i=1}^n (x_i - \bar{x})^2} \quad (11)$$

式中: n 为样本数; x_i 、 x_j 表示变量 x 在空间位置的观测值 i 、 j ; W_{ij} 定义的是空间权重矩阵 W 的元素, 表示空间位置 i 、 j 之间的邻近关系。全局 Moran' sI 取值范围在 $-1 \sim 1$ 之间, 当其值大于 0 时, 表示绿色文化产业于绿色旅游产业的协调度为空间正相关, 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 当小于 0 时, 表示绿色文化产业和绿色旅游产业的协调度为空间负相关, 即存在空间分散现象, 当其等于 0 时, 则表示分布相互独立。很明显, 地区空间事物越集聚, 取值就越接近 1, 空间事物越离散, 取值就越接近 -1 。

②局部空间自相关。

该方法主要用来探究绿色文化与绿色旅游产业局部相关特征。因此, 为识别局部空间自相关, 需要计算局部空间统计量 (LISA):

$$I_i = \frac{x_i - \bar{x}}{S^2} \sum_{j=1}^n W_{ij} (x_j - \bar{x}) \quad (12)$$

式中: n 为样本数, W_{ij} 定义的是空间权重矩阵 W 的元素。

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的标准化统计量为:

$$Z(I_i) = \frac{I_i - E(I_i)}{\sqrt{Var(I_i)}} \quad (13)$$

式中: $E(I_i)$ 和 $Var(I_i)$ 是理论期望和理论方差。其中, 局部集聚类型包括高一高 (H-H)、低—低 (L-L)、高一低 (H-L) 及低—高 (L-H) 共 4 种类型, H-H 表示自身和周边水平均较高, L-L 表示自身与周边水平均较低, H-L 表示自身水平较高且被低水平区域包围, L-H 表示自身水平低且被高水平区域包围。

(4) 地理探测器法。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探测空间分异性且同时用来考察影响因素的统计学方法, 既可以探测数值型数据, 也可以探测定性数据,

从而使其具有较明显优势^[27-30]。基于此，本文利用地理探测中的因子探测来考察中国七大分区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水平分异的主导因素，即运用因子探测来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文旅融合协调效应的解释力度，其模型为：

$$P_{D,U}=1-\frac{1}{n\sigma_U^2}\sum_{i=1}^m n_{D,i}\sigma_{U,D,i}^2$$

(14)

式中： $P_{D,U}$ 为影响因素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力探测指标； n 为区域数； $n_{D,i}$ 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 m 为影响因素的样本数； σ_U^2 为一级区域绿色文旅融合协调效应的方差； $\sigma_{U,D,i}^2$ 为次一级区域绿色文旅融合协调效应的方差。假设 $\sigma_{U,D,i}^2 \neq 0$ ，模型成立， $P_{D,U}$ 的取值区间为[0, 1]，当 $P_{D,U}=0$ 时，表明绿色文旅融合的协调效应不受影响因素的驱动，而 $P_{D,U}$ 值越大，则表明影响因素对绿色文旅融合的协调效应的影响越大。

2.2 研究区域

本文选取了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划(港澳台除外)，按照地理位置将其分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七大区域进行评价分析(表 3)^[31]。

表 3 我国七大区域及省份划分

区域名称	省份名称
东北地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
华北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华东地区	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江西
华中地区	湖北、湖南、河南
华南地区	广东、广西、海南
西南地区	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西北地区	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

2.3 数据来源

旅游产业数据来源于 2005—2018 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旅游统计公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文化产业数据来自 2005—2018 年《中国文化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

3 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3.1 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差异

通过计算可得中国及其七大分区绿色旅游产业与绿色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度(表 4)。由表 4 可知，2004—2017 年我国绿色

旅游产业与绿色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 0.458，表明我国绿色文旅融合整体上处于基本协调水平，但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波动变化。然而，我国七大分区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却存在较大差异，按耦合协调度排序为：华东>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其中，华东、华南及华中地区的绿色旅游产业与绿色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水平。而在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上，华东、华南地区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处于基本协调水平的地区有华中、华北及东北区域，而西北、西南地区则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因此，总体上中国七大分区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对于西北及西南地区而言。



图 1 2004 年和 2017 年中国绿色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分布

进一步利用 ArcGIS 将 2004 年、2017 年中国绿色旅游产业及绿色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分布进行空间表达(图 1)。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两个年份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以此递减的趋势。具体而言，2004 年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处于极度失调及中度失调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华北、华中、华东及华南地区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则处在基

本协调及以上，其中处于良好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有华东地区的江苏、浙江及上海等地，而华南的广东则处于极度协调发展水平。到了 2017 年，轻度失调等级在华北地区呈现出空间扩展的趋势，由 2004 年的基本协调水平变为轻度失调状态，说明华北的绿色旅游产业与绿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协调进一步加剧。极度失调仍出现在西北地区，其中西南地区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轻度失调状态，中度失调等级空间分异明显，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的青海、东北地区的辽宁及华南地区的海南。而华东和华中地区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则继续保持或向好发展，处于协调状态，这一分布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文旅融合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总体上看，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未来需要根据各分区的文化产业及旅游产业发展目标，优化七大分区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的相关策略。

表 4 2004—2017 年中国及其七大分区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时间变化

年份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全国
2004	0.440399	0.455135	0.564254	0.487269	0.522931	0.371069	0.323557	0.453238
2005	0.443979	0.468234	0.590818	0.516823	0.530772	0.402474	0.331754	0.471702
2006	0.443497	0.470386	0.594967	0.521607	0.550804	0.401283	0.343165	0.476989
2007	0.444519	0.455741	0.599853	0.508869	0.537713	0.393273	0.328451	0.469665
2008	0.443889	0.442709	0.597188	0.493335	0.509086	0.373120	0.322658	0.458441
2009	0.396468	0.408377	0.573424	0.458734	0.473875	0.349470	0.295046	0.427925
2010	0.426585	0.439005	0.600882	0.507718	0.523818	0.389482	0.331326	0.463858
2011	0.408894	0.440019	0.588483	0.490399	0.528367	0.381889	0.327428	0.456421
2012	0.411191	0.452746	0.595551	0.502832	0.530769	0.417547	0.333312	0.468428
2013	0.421580	0.469600	0.608802	0.516065	0.526965	0.441087	0.340367	0.480991
2014	0.400974	0.449774	0.605774	0.520719	0.498841	0.427733	0.359154	0.473720
2015	0.370747	0.441833	0.565292	0.477316	0.485812	0.391558	0.312979	0.441630
2016	0.364140	0.432988	0.564129	0.472977	0.486687	0.402506	0.316830	0.441353
2017	0.353946	0.416132	0.559837	0.475250	0.492779	0.403394	0.314666	0.437282
均值	0.412201	0.445906	0.586375	0.496422	0.514230	0.396135	0.327193	0.458689

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可进一步探究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及其空间集聚差异(表 5)。由表 5 可知，2004—2017 年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 Moran' sI 值均为正，且其 P 值也都大于 0，则表明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存在集聚分布，且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总体上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 Moran' sI 指数呈现不断增加趋势，表明其空间正相关性增强，空间集聚具有上升趋势，即中国绿色文化产业与绿色旅游产业的融合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表 5 2004—2017 年全球 Moran' sI 指数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Moran' sI	0.126	0.120	0.124	0.156	0.195	0.217	0.190
z	2.078	1.985	1.993	2.467	2.966	3.289	2.926
P	0.038	0.049	0.040	0.014	0.003	0.001	0.003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Moran' sI	0.174	0.147	0.145	0.170	0.129	0.149	0.160
z	2.722	2.375	2.320	2.650	2.108	2.375	2.550
P	0.006	0.018	0.020	0.008	0.035	0.018	0.011

表6为2004年及2017年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局域自相关分布。从中可以发现，2004年高一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的浙江、上海及江苏，表明这些省份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较高。2004年的低—低集聚区则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的西藏，这是因为西藏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相对于其周边省份要低，与邻近省份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该区域虽有较好的旅游和文化资源，但其发展人才不足、远离文化和旅游产业核心消费市场，是未来需要着力扶持区域^[1]。到2017年，高一高集聚区开始向临近省份扩展，表明相互毗邻的地区开始拉动区域绿色文旅融合发展，形成良性互动。2017年，浙江、上海、江苏及安徽均呈现高一高集聚状态，而其他区域则表现出不显著状态，说明安徽受到周边高一高集聚区域的正向辐射作用，通过引进先进经验、加强跨区域合作、提升软硬实力，促进了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融合，这种发展过程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13]。

表6 2004年、2017年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局域自相关分析

局部聚类	2004年	2017年
高一高	浙江、上海、江苏	浙江、上海、江苏、安徽
高一低	—	—
低—高	—	—
低—低	西藏	—

3.2 影响因素分析

借助因子探测器考察2004年及2017年的旅游产业收入(X_1)、旅游产业基础(X_2)、旅游环境建设(X_3)、文化产业经营(X_4)、文化产业基础(X_5)、绿色文化消费(X_6)等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态势的影响。表7为2004年文旅融合协调态势的六大影响因子的q值，各因子的影响程度的排序为：文化产业经营(0.9256)>旅游产业基础(0.8033)、绿色文化消费(0.8033)>文化产业基础(0.7108)>旅游产业收入(0.5706)>旅游环境建设(0.1868)。绿色文旅耦合协调态势是这六大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产业经营、绿色文化消费、旅游产业基础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具有较强贡献率，而旅游环境建设的q值较小，说明其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的贡献率较小。

表 7 2004 年因子探测结果

影响因素	X ₁	X ₂	X ₃	X ₄	X ₅	X ₆
qstatistic	0.5706	0.8033	0.1869	0.9256	0.7108	0.8033
P-value	0.8846	0.2253	0.9876	0.0277	0.3733	0.2253

表 8 为 2017 年绿色文旅融合协调态势的六大影响因子的 q 值。从中可以发现，各因子的影响程度的排序变为：绿色文化消费 (0.8436) > 旅游产业基础 (0.8324) > 旅游产业收入 (0.8144) > 文化产业基础 (0.5056) > 文化产业经营 (0.4231) > 旅游环境建设 (0.1038)。绿色文旅融合协调态势是这六大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绿色文化消费、旅游产业基础、旅游产业收入对文旅融合协调发展态势具有较强的贡献率，而旅游环境建设的 q 值较小，说明其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态势的贡献率较小。

表 8 2017 年因子探测结果

影响因素	X ₁	X ₂	X ₃	X ₄	X ₅	X ₆
qstatistic	0.8144	0.8324	0.1038	0.4231	0.5056	0.8436
Pvalue	0.1989	0.4286	0.9106	0.9568	0.5834	0.4914

2004 年和 2017 年六大影响因子的 q 值均表明，旅游环境建设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态势的影响最小，说明国家颁布的相关绿色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绿化覆盖面积)、资源环境质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以及资源禀赋(自然保护区个数、自然保护区面积)还有待完善、国民环保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19]。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2004—2017 年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处于基本协调水平，中国七大分区融合发展水平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耦合协调度排序为华东>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南>西北，西南及西北地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华北、华中及东北则处于基本协调水平，而华东及华南的融合发展达到中度协调，中国七大分区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2) 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递减趋势，存在明显空间分异，2004—2017 年，华北地区的融合发展由基本协调向轻度失调发展，轻度失调状态在西北、东北及华南地区均存在分布，而华东、华中地区的融合发展水平继续保持，处于协调状态。

(3) 2004—2017 年，中国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度呈现空间集聚效应，整体上处于良好态势。2004 年及 2017 年融合发展水平的局域空间集聚类型为高一高、低—低，其中高一高集聚类型主要出现在华东地区的浙江、上海等地，而低—低集聚类型则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的西藏。总体上中国七大分区的绿色文旅融合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分异。

(4) 2004 年，文化产业经营、绿色文化消费、旅游产业基础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贡献率，而旅游环境建设对

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的贡献率则相对较小。到了2017年,绿色文化消费、旅游产业基础、旅游产业收入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态势的贡献仍较大,至少各因子贡献率的顺序有所变动,而旅游环境建设对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态势的贡献依然较小。

4.2 建议

一是在全力推进绿色文旅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应坚持“立足本土特色,各自产业特色、优势互补”的发展思路,打造绿色文化旅游特色经济带;突破既有旅游模式和思路局限,通过要素资源的共同融合和有效的政策支撑,形成完善的绿色发展规划和坚实绿色的旅游活动理念,为绿色文旅发展奠定扎实前提和基础。同时积极引进关键技术和稀缺人才,重视文化旅游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核心动力。

二是西部地区自身应深度挖掘其旅游与文化资源特色,开发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积极学习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转变发展方式,打破低一低集聚的局面,主动争取跨区域合作。而东部地区则应进一步发挥其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开发绿色旅游与绿色文化产业融合的新兴业态,创新服务和产品形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强化中国沿海及中部主要省区绿色文旅融合的溢出效应,强化与周边省区合作,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增强其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区域合作联动发展。增强对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绿色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提升其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水平。

三是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在持续推进绿色文旅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更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构建文旅融合的生态保护机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有序推进绿色文旅融合。此外,未来在推动我国区域绿色文旅融合协调发展的同时,应关注其旅游环境建设问题,完善相应政策,提高国民环保意识,以此提高绿色旅游的贡献率。同时,还应站在全局角度、长远发展的高度,发挥绿色文旅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桥梁作用,向全球传递中国文旅声音,讲好中国文旅故事。

参考文献:

- [1]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态势及其驱动力[J].经济地理,2020(6):203-213.
- [2]朱蓓,肖军.绿色产业发展研究综述[J].安全与环境工程,2019(6):29-33.
- [3]Kostopoulou S.On the revitalized waterfront:creative milieu for creative tourism[J].Sustainability,2013,5(11):4578-4593.
- [4]Kole S K.Dance,representation,and politics of bodies:“Thick description” of Tahitian dance in Hawaiian tourism industry[J].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ce,2010,8(3):183-205.
- [5]尹华光,王换茹,姚云贵.武陵山片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39-43.
- [6]孙玉梅,秦俊丽.山西省文化旅游资源的特征与文化产业发展模式[J].地理研究,2011(5):845-853.
- [7]马勇,王宏坤.基于全产业链的我国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1(4):143-148.
- [8]但红燕,徐武明.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动因及其效应分析——以四川为例[J].生态经济,2015(7):110-113.

-
- [9]黄蕊,侯丹.东北三省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J].当代经济研究,2017(10):81-89.
- [10]兰苑,陈艳珍.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机制与路径——以山西省文化旅游业发展为例[J].经济问题,2014(9):126-129.
- [11]李臻.对外开放背景下我国文旅产业发展趋势分析[J].人民论坛,2019(26):80-81.
- [12]李凌雁,翁钢民.我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5(6):94-99.
- [13]翁钢民,李凌雁.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相关分析[J].经济地理,2016(1):178-185.
- [14]张琰飞,朱海英.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2(10):54-59.
- [15]许凌.基于绿色发展的文旅小镇建设及影响[J].社会科学家,2019(8):80-85.
- [16]任海军,曹盘龙,张爽.基于熵值法的生态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4(5):71-76.
- [17]侯兵,周晓倩.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态势测度与评价[J].经济地理,2015(11):211-217.
- [18]程广斌,杨春.中国省域产业融合能力:理论解构、评价方法及时空分异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7):61-67.
- [19]耿树丰,国安东,杨俊,等.中国绿色旅游基地适宜性综合评价[J].地理科学,2019(9):1507-1515.
- [20]田磊,张宗斌.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116-125.
- [21]刘佳,宋秋月.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与形成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8):127-137.
- [22]向宝惠.加强旅游业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J].旅游学刊,2016(10):5-7.
- [23]明翠琴,钟书华.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设计[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2):249-252.
- [24]豆艳荣,王有炜.中部6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绩效测评——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证分析[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8-44.
- [25]车树林,顾江,郭新茹.文化产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7(2):38-46.
- [26]周正刚,陈曙光.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探讨[J].广东社会科学,2008(5):67-72.
- [27]王新越,孟繁卿,朱文亮.我国热门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的研究[J].地域研

究与开发, 2020(2): 76-81.

[28]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1): 116-134.

[29]李勇泉, 张雪婷. 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的研究[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15-25.

[30]梁巧霞, 黄杰, 谢霞, 等.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天山北坡旅游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6): 82-88.

[31]曲景慧.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变动分析[J]. 生态经济, 2016(9): 129-134.